



十枚简 一桩案

王杖:汉代老人的“法律护身符”

周皓伦



《王杖十简》



王杖(鸠杖)

在汉代,殴打一位手持王杖的老人,后果有多严重? 有一起案件被《王杖十简》完整记录下来。

1959年,甘肃省武威市磨嘴子汉墓中出土了十枚长约23厘米的木简,这便是《王杖十简》,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。木简以隶书精写,内容次分明,前半部分收录了两方面内容:一是汉成帝建始二年(公元前31年)系统规定授王杖之制,明确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享有法定特权;二是记录了吴赏案的判例,以案释法。后半部分载有幼伯于东汉永平十五年受杖的实录。这组木简生动展现了从立法、司法到权利凭证的完整链条,是研究汉代养老法律制度无可替代的第一手史料。

木简记载:“河平元年,汝南西陵县昌里,先,年七十,受王杖。颍郡游徼吴赏使从者殴击先……廷尉报:罪名明白,赏当弃市。”该案涉及两名主要人物:一名是基层官吏吴赏,另一是一名是一位七十岁的持杖老者。吴赏指使随从殴打了持王杖的老人。廷尉根据简文中“有敢妄骂詈殴之者,比大逆不道”的法律规定,认定吴赏殴打辱骂持杖老人,以谋逆大罪对其判处“弃市”之刑。该案昭示了汉代对“养老”与“尊老”的态度,具有法律强制力保障的刚性原则。

与《王杖十简》一同出土的,还有一根长约2米的彩绘木杖(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),杖杆粗细均匀,鸠鸟横卧杖端,口含食粒。这是一件融合了礼制与法律的独特信物,也是国家权力的延伸。其形制有严格规定,“长九尺,端以鸠鸟为饰”。鸠鸟寓意“不噎”,寄托了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,同时“鸠”通“久”,蕴含尊崇长久之意。更重要的是,简文中明确规定,王杖“比于节”,即其威严等同于天子符节,百姓“望见之”须心生敬意。木简中更有“王杖不鲜明,得更缮治之”的表述,以确保其作为法律信物的尊严永不褪色。王杖制度把对老年人的保护,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。

老年人一旦年满七十受杖,便可借此享有相当于中级官员,即“比六百石”的政治待遇,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特权——

在政治与礼仪层面,持杖者可“入官廷不趋”,面见皇帝、官员免行小步快走之敬礼;还可“得出入官府郎第,行驰道旁道”,自由出入官署并在天子驰道旁行走。这无疑打破了森严的等级限制,赋予老者极高的社会尊严。

与之配套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与赋役优待。《王杖十简》规定“市卖复毋所与”,持杖者经商终身免税,提升了其自我保障能力。更值得称道的是,木简还规定“有旁人养谨者,常养扶持,复除之”,即使非亲非故者,只要尽心赡养老人亦可免役。这体现了国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的智慧,初步构建了家庭、社会与国家养老责任共担的格局。

由此可见,一方面,法律对老人予以司法宽宥,“犯罪耐以上,毋二尺告劾”,若非首谋杀人和伤人重罪,官府不得随意拘审持杖老人;另一方面,对侵犯者施以重刑:“有敢征召、

侵辱者,比大逆不道”。吴赏案正是对该法条的实践,将殴打老人的罪行等同于谋反,处以极刑,以国家强制力为敬老传统提供了法律保障。

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《王杖十简》及其所承载的汉代养老法律制度,对当今老龄化社会的治理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

汉代秉持“以孝治天下”的治国理念,通过王杖制度实现了从道德引导到法律强制的跨越,揭示了法治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基础性作用。汉代将“敬老”从道德倡导升格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,通过明确的授权性规定和严厉的禁止性规范,为尊老养老提供了清晰、稳定的行为预期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。这种德法共治的模式对当代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
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司法保障。民政部、全国老龄办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、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《关于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在第(七)项“强化涉老纠纷司法保障”中明确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检察履职的相关内容。近年来,最高检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能,坚持依法精准规范监督,推动解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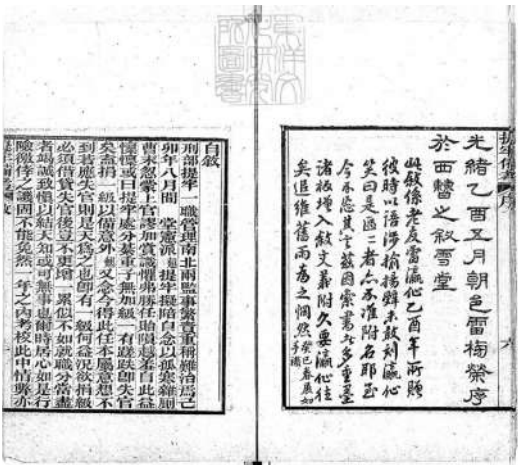
医疗、探视等规定,特别是明确狱卒的法律责任,不仅要求狱卒不得欺凌囚犯,防止狱中出现囚犯之间的凌虐现象,也要求其及时给予需要医疗的囚犯应有的善待,从规范层面较为系统地强化了囚犯的权利保障。

顺势更新法规,完善法规施行机制。赵舒翘提出:“制随时变,拘泥匪通;法赖人行,维持乃久。”他认为,规章制度随时势而变化,不能拘泥于旧制,而法律要维持长久,无凭人来施行。为了方便提牢官掌握法律,熟悉成例,他还特意在条例之外增加了章程的内容,要求“同后约束禁牢条款,每年提牢上任时刷印标示一次,以新耳目,而申警戒”,让法规执行更贴合实际需求。

告诫后任依法履职,传承公正治理理念。赵舒翘在系统梳理并更新狱政管理法规内容时,特别声明,相关内容前任均有探索,自己仅将其汇总并加以整理。之所以作这些努力,是真诚期待狱政有所改善,并且希望继任者能够在自己已经整顿的法制秩序之下尽心竭力,公心任事,所谓“提牢固属烦难,然法治严肃,事权归一,较在司办小事掣肘时聚讼诸弊,苟公正而无私,允兮令之罔阻”。同时,他也告诫继任者,如果不能秉公任事,遇事畏缩不前、战栗恐惧、目光短浅、固执己见,则“为吏更何所笑也,若无知而作任意以行,则又失矣”。

《提牢备考》对囚犯的规范化管理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总结,并立足囚犯无助、孤苦、弱势的一面,重点提醒监狱管理官员和狱吏要恪尽职守,多存仁爱之心,心怀矜恤之心。由此可见,赵舒翘的矜恤囚犯和狱政改革观念并不是孤立的,抑或一日形成的,而是伴随着儒学素养与法律素养的提升,在为官任职的漫长岁月中逐步发展起来的。他的立功立言,对同僚及司法制度的改革均有启发。清末杰出人物王步瀛评价道:“先生之为学宗法程朱,以诚敬为根,其忠君爱民则本所心得,以措诸实行,足以扶翼教,有古大儒名臣之风。”徐怀璋称赞道:“先生不以理学名,而生平志事无一不归于切实,正色立朝,清白乃心,其所措施类皆古名臣经国之学,今其遗书可见也。”《提牢备考》为研究清代监狱立法、提牢制度提供了珍贵史料,在律例之外另辟监狱学著述之蹊径,丰富了“陝派律学”乃至清代律学的研究领域和内容。

【作者单位:西北政法大学。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清代律学知识体系研究(25BFX184)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】



《提牢备考》光绪十九年重刊本

主臬。”由此声震天下,并在考核中被评定为京察一等。光绪帝召见赵舒翘时,曾当面夸奖他“前在秋审处当差甚好,例案极熟悉”。沃丘仲子在《近代名人小传》中亦评价:“予素接凤翔人士,皆言舒翘任监司,治其地有年,廉公有威,吏畏民怀,为近百年来良吏第一。”《提牢备考》是赵舒翘任刑部提牢主事时,收集整理清建政以来有关监狱管理的条例、章程及重要狱务的处理方法等,编纂而成的一部关于监狱管理的重要著作,是“陝派律学”的重要代表作,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监狱学著作。《提牢备考》共四卷,分别为《囚粮考》《条例考》《章程考》《杂事考》。赵舒翘在书中对矜恤囚犯着墨尤多,强调对老、幼、女囚以及病囚应加以关怀和体贴等,蕴含浓郁的人道主义和狱政改革观念。这些理念并非空谈,而是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狱政管理实践,贯穿制度规范、执行机制等各个层面。

规范囚粮管理,筑牢狱政民生底线。民以食为天,囚犯的基本权利保障亦以囚粮为要,赵舒翘首先关注囚粮发放,以示对传统儒家人本主义的遵循,并计划由此着手推动狱政管理的规范化。他在《提牢备考》中开宗明义,由于监狱需要用的物品不一而足,唯独囚粮是大量需要的,因此唯有囚粮方面的积弊最深。为了杜绝官吏在领取囚粮时与米铺勾结而弄虚作假,他要求领米时,派司狱一名、南北两监头役各一名,相互监督。他还强调保障囚饭按时发放,为犯人与提牢官见面创造机会,使犯人在蒙冤受屈时能够及时申诉。

规范狱政規制,强化囚犯权利保障。有规矩方成方圆,狱政管理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法规。赵舒翘认为:“宪典昭著,共宜遵守”,提牢官责任重大,动辄关乎功过是非,尤须在法律的约束下兢兢业业、奉公执法。在《条例考》中,赵舒翘详述对囚犯的用刑、羁押、

律学中坚赵舒翘的治狱答卷

一部《提牢备考》凝聚清代狱政的务实与温度

全孟明



人物

赵舒翘,字展如,号琴舫,晚年号慎斋,陕西长安(今陕西西安市)人。同治十三年中进士,授刑部主事,后历任刑部提牢厅主事、直隶司主事、刑部员外郎、刑部左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军机大臣等职。史书及文集多记述其刚正执法、善平冤狱、勇于任事、精通律学等事迹,相关记载亦见于《清史稿》《清史列传》《续修陕西通志稿》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等典籍。赵舒翘精通律意,长于狱政法规的稽考和阐发,秉承求真务实、体恤百姓疾苦之心,在司法审判中以“刚正不阿”“抗直敢言”的品格立身,终成清代著名“陝派律学”的中坚力量。他参与审理的王树汶临刑呼冤一案,“累次再审及讯囚、取供、定罪,皆展如一手办理。案结后所存爱书奏稿不下数十件,各处传播奉为司法

持酿酒器具竟要处罚?

看简雍如何以智谏破机械执法

张欣瑞 李启铭

司法官的裁决本质上是对“禁止酿酒”法令的机械执行,反映了古代治理“重秩序、轻变通”的倾向。在粮食短缺的紧急情境下,试图通过“严惩持有酿酒器具者”的方式,从源头上遏制酿酒行为,以确保保法令的威慑力,维护政权稳定、保障民生需求的初衷可以理解。但目的正当不能替代手段合法,简雍的劝谏恰恰突破了这种机械思维。他以类比方式点明核心:法律惩戒的应是实际危害行为,而非“可能用于犯罪的工具”;若仅以“持有工具”定罪,无异于“欲加之罪”,让百姓对法令产生抵触心理,反而不利于治理目标的实现。古代司法并非单纯追求“严刑峻法”,而是强调“法令需合人情、循事理”。简雍的做法正是通过唤醒统治者对“情理”的重视,避免法令走向苛严僵化,实现“惩恶”与“劝善”的平衡。正如后世官员断案常以“敦风俗、笃孝义”为根本,“原欲酿酒案”亦是如此,体现了古代治理者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追求。既要通过法令维护秩序,也要兼顾百姓的合法权益,避免因过度执法而伤了民心。

从历史情境回到当代,“原欲酿酒案”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故事性,更在于其为犯罪治理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启示,这种启示可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层面展开分析。在实体法层面,该案直指犯罪预备认定的核心问题。根据我国刑法第22条,“为了犯罪,准备工具、制造条件的,是犯罪预备”,但惩罚犯罪预备行为的前提是该行为对法益已产生抽象危险,且需证明行为人具有明确的犯罪意图。古代官员将“持有酿酒器具”等同于“酿酒行为”,忽略了“工具用途的专门性”与“主观意图的关



简阳农民画《简雍戏谏刘备》

创作者:张树敏

联性”。酿酒器具虽可用于酿酒,但也可能是百姓此前合法持有、未及处置的物品,不能仅凭持有工具便推定行为人有犯罪意图。

在程序法层面,该案强调实质审查在司法中的重要性。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,简雍的讽谏属于“非正式纠错”。而在当代司法体系中,检察机关作为犯罪追诉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,肩负着过滤不当追诉、防止刑罚滥用的重要职责。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起诉环节,需重点审查能够证明行为人有主观故意的证据与“工具一行为关联性”。对仅持有工具、无明确犯罪意图或实行行为的案件,应依法作出不予起诉决定,避免浪费司法资源;对虽有预备行为、但社会危害性极小的案件,可通过行刑反向衔接,建议行政机关予以处罚,实现宽严相济。

发生于近2000年前的“原欲酿酒案”启发我们,既要坚守法律底线,也要融入对人情事理的体察。简雍以智慧化解了古代机械执法,当代犯罪治理,更需在实体法上严格界定犯罪构成要件,防止滥用刑罚;在程序法上,强化监督制约,确保司法公正。唯有如此,才能构建起“情理与法理交融、秩序与自由平衡”的法治秩序,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,也是其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。

【作者单位:东南大学法学院、江苏徐州市丰县人民检察院】

凡一线可生 皆曲予宽贷

孙棋棋

漫谈



简阳农民画《简雍戏谏刘备》

创作者:张树敏

案说